

戴国辉与东南亚华人研究

安焕然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中文系

摘要

享誉日本学界的戴国辉，以其生命史边缘化的心境，同理心地感受东南亚华人的苦闷与矛盾。戴国辉以世界史的研究高度，把握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探索东南亚华人的内在问题。处居少数，又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意识的择善固执；戴国辉抱以理解的同情。他认为，东南亚华人边陲意识的激越反动心理，并非华人独有，而是第三世界受欺凌的人们所一直追求，普遍的价值：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尊重与社会正义的实现，这是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

关键词：戴国辉 东南亚 华人 马来西亚

一、前言

以东南亚华人研究和台湾史研究称著于日本学界的戴国辉（1931-2001），在任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期间，到访东南亚进行华人文献资料的搜集，并在70、80年代以日文撰写不少关于东南亚华人研究课题的论文。1980年出版的《华侨：“落叶归根”から“落地生根”への苦闷と矛盾》，则是戴国辉在此研究领域的代表之作。¹

2011年，台北文讯杂志社出版了27卷的《戴国辉全集》，并把戴国辉的日文论著全译成中文收载于《全集》。其东南亚华人研究部分主要集中在《全集》之第十卷〈华侨与经济卷一〉、第十一卷〈华侨与经济卷二〉及第十二卷〈华侨与经济卷三〉。本文尝试就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人研究，作一评述。

二、戴国辉的生命史追述及其学术之路

戴国辉，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台湾中坜郡平镇庄（今桃园平镇），是台湾客家人聚集的地区。然而走出这个乡镇，台湾实是福佬闽南人为主的岛屿。客家人仅是台湾的少数。

中学时代，戴国辉到新竹州立中学就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校园里，日本人学生常常欺侮“本岛人”。戴国辉开始感受到台湾“本岛人”同受日本人的欺凌，却又感叹于彼此内部的不团结。当时，同属“本岛人”的福佬闽南系和客家系同学之间都对彼此存有一些相当负面的刻板印象。客家同学视闽南系同学“狡猾”、“油条”，而大多数从乡下出来的客家同学，对于都市的商业社会没有什么认识与体验，闽南系同学遂讥笑他们“阿呆”

1 戴国辉《华侨：“落叶归根”から“落地生根”への苦闷と矛盾》，东京：研文出版，1980。

(笨蛋)。由于这种区别，戴国辉感受到，当时台湾的客家人和闽南系福佬人同样受日本人欺凌，但他们之间却难于构起“被迫害者”间的共识与连带团结。戴国辉指出，这是基于语言、生活习惯和气质的不同，同时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挑拨离间政策促进了“本岛人”之间的分歧所致。²

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台湾光复。戴国辉从军的大哥从东南亚“复员”回来台湾，告诉他关于东南亚的见闻，提及当地的华人社会也有很多和他们家讲同样客家话的客家人，甚至于有与他们家母亲一样，梳同样发型头的，穿“大婆衫”的客家妇女。戴国辉认为，对客家认识的范围，分别将其在现实中延伸东南亚，在文献上延伸到中国大陆，都是大哥帮他做到的。³

如果说戴国辉的生命史决定了他的研究，而他的研究又重塑了他的生命，那么，生命史的追索也就一直贯穿在戴国辉的学术关怀之中。事实上，戴国辉的学术生涯涉猎虽广，却不能孤立看待。1955年，戴国辉留学日本，其后十年间在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原本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7世纪到17世纪中国甘蔗糖业发展的历史。研究所毕业后，进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因其台湾出身的背景，遂以台湾经济为中心，与日本学者合编了《台湾经济总合研究（上、下·资料篇）》（1968）及《台湾农业（上、下）》（1972）。后来又因是出身台湾，会讲客家话，而闽南话也懂一些，促使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围延伸到当时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在中国经济史、台湾史和华人研究三者之间，并非一无关系，而是其研究的连锁。

2 戴国辉《“中国人”的中原意识与边疆观——从自我体验来自我剖析或解释》，《戴国辉全集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18。

3 戴国辉著，蒋智扬译《对中国人而言之中原与边境——与自身之历史（台湾、客家、华侨）相连起来》，《戴国辉全集8》，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333。

旅居日本多年，戴国辉始终抱着一种“尊严”为处世哲学。除了民族的尊严，他认为“出生的尊严”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选择自己的父母亲，双亲或单亲是什么人，即生为什么人。⁴可以这么说，戴国辉的身份认同意识，来自于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尊严自觉，处在“边陲”的少数族群，该要如何积极地回应和消解自己受歧视的窘境和苦闷，一直是戴国辉学术关怀的其中一个焦点。

三、戴国辉的华人研究

戴国辉在任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期间，曾至东南亚，对华人社会，特别是客家人进行访问，奠定了其华人研究之根基。

与戴国辉身为台湾客家人的身份认同相似，同样是处居边陲，同样是东南亚各国的少数族群，日本学界惯用之“华侨”，是戴国辉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主柱。⁵ 1966年戴国辉留日学业告一段落，决定在日本就业，最初的专职工作地点是亚洲经济研究所。虽然事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把华人研究当作自己的研

4 戴国辉《台湾客家的认同问题》，《戴国辉全集4》，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228。

5 日语中的“华侨”二字，既是俗称也是概称。但随着战后政治局势的转变，东南亚“华侨”多已从“落叶归根”转变成“落地生根”政治认同意识日浓的“华人”，所以“华侨”一词并不适当地用以概称东南亚华人。严格来说，华侨是指仍保有中国国籍而长期居留在外国者，华人则是指血缘与文化上还保留“中华民族”之纽带，但国籍上已无关系者。戴国辉研究“华侨”，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而他虽仍延用“华侨”一词，是在日本学界的一种习惯用法，其实同时涵盖了华侨与华人两部分。戴国辉在使用华侨一词时，经常是加上了引号的“华侨”这样的标记方式。见戴国辉著，莫海君、彭春阳译《客家系“华侨”的故事——世界客属第五届联谊大会》，《戴国辉全集·未结集12：东南亚华侨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281。

究课题之一，⁶但是会讲中国方言、客家话和闽南话，却是戴国辉从事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条件之一。⁷

戴国辉秉持一贯的治史自觉性，注意到应该在“世界史”的视野上，以及在与东南亚的有机结构上抓住当地华人问题来做研究。他强调，研究东南亚华人，必须把问题放置在当地的历史脉络中，以及当地具体的政经文教结构下去重新审视和描绘华人社会的真实样貌。唯有把华人社会当成当地社会的一部分来讨论，才可以正确分析其结构。如果欠缺把握华人在当地的客观面貌，甚至不恰当的以主观意图去看东南亚华人问题，也可能会助长当地种族冲突、民族分裂、压制华人的结果。⁸

戴国辉对东南亚，特别是对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的实况，具有一份“同理心”的理解。根据他的观察，东南亚复合经济社会的困境以及其排华暴动的悲剧性历史根源，事实上与日本殖民台湾岛民一样，是欧美将亚洲变成殖民地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是殖民地统治过程中产生的不幸结构。令人遗憾的是，此种结构性问题经常不被人察觉。只要东南亚华人继续在国内和国际上被当成政治抗争的棋子，利用狭隘的种族主义来取得或维持政权的不人道政客继续存在，悲剧性的状况就不会改变。⁹

6 戴国辉著，蒋智扬译《对中国人而言之中原与边境——与自身之历史（台湾、客家、华侨）相连起来》，《戴国辉全集8》，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342。

7 戴国辉著，冯雅晴、吴元淑译《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华侨研究与华侨观的省思》，《戴国辉全集12. 未结集：东南亚华侨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103。

8 戴国辉《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观点》，《戴国辉全集11》，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79-106。

9 戴国辉著，李毓昭译《来自内部的“华侨”论——以东南亚为主》，《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285-316。

1969年秋，戴国辉首次到访东南亚，从事实地考察的工作。这一年的5月，马来西亚发生了513种族暴动，而在此3年前，印尼苏卡诺政权发生政变，也爆发了930排华事件。面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苦难，戴国辉以人道主义立场，撰文提醒日本学界，不应与东南亚的狭隘种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为伍，切勿成为帮凶，陷华人于不义。¹⁰

戴国辉告诉日本学界这样的一个事实：东南亚华人不全是有钱有势的华商阶层，却可悲地常被当地极端的种族主义及政治权谋家做为政治抗争的棋子，煽起当地土著的排他情绪。他认为，若要探讨印尼的排华问题，就必须去探索印尼人贫困的真正原因，从历史观点去分析、了解把华人当成代罪羔羊，以及印尼持续这么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¹¹

对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推行的土著优先政策，戴国辉亦有他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亦是渴望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同样取得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但戴国辉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前景却是抱持一定的乐观态度。他认为，马来西亚所面临的集体相互关系是历史的遗产，如果有持续负面影响，同时也拥有转向正面的可能性。马来西亚的华人问题，事实上同时也是马来人及印度人的问题，彼此间应相互承认这一点，并要用心善意协调。马来西亚拥有不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同处于一个国度，这是当下所追寻的人类共通问题之一。从国际环境的现状来看，戴国辉甚至乐观地以为马来西亚国民国家的形成及其族群关系的重新定位，将会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实验场

10 戴国辉著，李毓昭译《来自内部的“华侨”论——以东南亚为主》，《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285-316。

11 戴国辉著，李毓昭译《来自内部的“华侨”论——以东南亚为主》，《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292。

所”。¹²

戴国辉在《华侨：“落叶归根”から“落地生根”への苦闷と矛盾》一书中，¹³提出双重／多元认同的观点，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法律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应该分开看待。中国政治影响力固然是东南亚“华人化”问题的“准外因”，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华侨”到“华人”，其中的苦闷和矛盾，主要关键无疑来自居住国本身。戴国辉认为，东南亚国家不应对华人进行强迫性的同化、统合政策，而应将华人视为本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塑造新兴国形象。

旅居日本四十余年，自道其研究途径是“以边陲射向中心”，戴国辉从东南亚的考察中注意到，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具有强烈的中华思想、中华意识。东南亚华人耗尽心力捍卫自己的民族性，其因由就在于处居边陲地位，在当地国面对人种或民族差别对待及疏离的状况。¹⁴

世界上到处充斥着压抑和歧视的问题，“中心与边陲”往往亦是相对的，少数族群面临歧视和差别待遇时，自然就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意识。这不单是东南亚华人的苦闷，关键在于如何回应。戴国辉常举例美国来做对比。他总是乐观地以为，处居边陲位置的人可以把负面的价值转化为一种积极进取、较正面的精神升华，带来创新境界的理想。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只是东南亚

12 戴国辉著，雷玉虹译《马来西亚的布米普特拉政策与华人》，《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457-487。

13 该书的中译本见于戴国辉《戴国辉全集11》，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中译书名为《华侨：从“落叶归根”走向“落地生根”的苦闷与矛盾》。

14 戴国辉著，蒋智扬译《对中国人而言之中原与边境——与自身之历史（台湾、客家、华侨）相连起来》，《戴国辉全集8》，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361-366。

华人的课题，也是第三世界受欺凌的人们所一直追求，普遍的价值：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尊重与社会正义的实现，这是世界人类共有的课题。¹⁵

四、当地脉络与世界史高度

评析戴国辉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主要在于反思华人研究的视角问题。早期西方的东南亚华人研究者主要是殖民地政府的“学政人员”，彼等之研究视角，常以西方为中心，其华人研究资料虽丰，对华人传统文化却存有偏见，亦忽视西方殖民主义的负面性。¹⁶

另一方面，1950、60年代，基于中国政局的剧变，原本对中国研究有高度兴趣的学者无法进入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人类学者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田野地点。除了台湾和香港之外，东南亚华人社会遂成了接受西方人类学训练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取向上的这层格局，当时的西方人类学者之研究东南亚华人，¹⁷ 主要是将东南亚华人社会视为中国社会的延伸，或是以此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¹⁸ 之后，李亦园开启台湾人类学界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亦是把东南亚华人当作一种“中国社会文化的实

15 戴国辉著，雷玉虹译《世界的动荡与东南亚华人的未来》，《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515。

16 Tan Chee-Be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edited by Leo Suryadinnat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pp121-122.

17 这方面论著，例如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罗伊菲译《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

18 赵树冈《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9月第3期，页61-62。

验室”来看待。¹⁹ 这种对当地“去情境化”的研究取向，忽略了对东南亚之“本土”主体性社会脉络的视察。毕竟，战后以来，东南亚华人有其自主意识和独特性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苦闷与矛盾，并非作为“中国”的替代品可以概括。

此外，当时的中国大陆学者，则基于意识型态的宏观叙述主导立场，突出强调东南亚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对西方殖民的反抗、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以及“华侨”艰苦创业和“爱（中）国爱乡”的意识。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重新得到关注。²⁰ 但直至90年代以前，仍受到时代格局及专业知识人才资源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局限。

至于日本学界，其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主要则是在于掌握实态的研究。彼等之研究动机包括如何利用东南亚华人，或如何与华人一同经营合资企业，或如何定位这个贩卖日本商品的交易者等型态的时代要求。²¹ 戴国辉对日本学界此种既功利又狭隘的研究心态，颇有批评。惟其东南亚华人研究，也与先前的中国学界及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视角大为不同。

戴国辉出生台湾，却属于台湾较少数的客家人，其身份认同是相当复杂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负笈日本留学，却因学术评论上批评台湾的独裁统治，被列入黑

19 李亦园在此方面的代表作有《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20 朱杰勤《关于开展华侨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收载于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345--350。该文原载于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论文集（一）》，1981，页14-23。

21 戴国辉著，冯雅晴、吴元淑译《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华侨研究与华侨观的省思》，《戴国辉全集12. 未结集：东南亚华侨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109。

名单，很长一段时期不能回返台湾。²² 此种边缘化的心境，在他从事东南亚华人研究时，也能以同理心去感受东南亚华人的苦闷与矛盾。

处居少数，又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意识的择善固执，戴国辉抱以理解的同情。然而，他亦意识到，边陲意识的激越反动心理，并不只是华人独有，而是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生命史的追索，加上人道的关怀，戴国辉的治史方法，主张必须把握当地国的历史文化脉络，强调其研究对象应当努力进行主体性的经营。惟与此同时，戴国辉更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以宽广的视野和思维去看待东南亚华人的问题。这亦是戴国辉经常自觉到的研究视角。²³

五、结语

战后以来东南亚各地的政局和社会剧变，华人在当地国的文化调适已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延伸的问题。研究东南亚华人，必须把握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重视到“国家”的制约及华人社会自主性及独特性的演变。然而，“本土视角”若仅是就“国别史”来论述，或就“地方”而“地方史”研究，格局太小，缺少了宏观的世界视野。在“本土”与“中国”之间，华人研究若仅偏执一方，各有洞见，也有其“不见”和偏失之处。

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其可贵之处在于，以其生命史边

²² 对戴国辉生平之论述，可参见汤锦台《千年客家》之第十一章《三个客家人 的故事之“热爱台湾的读书人戴国辉”》，台北：如果出版社，2010，页279--291。

²³ 戴国辉著，雷玉虹译《世界的动荡与东南亚华人的未来》，《戴国辉全集 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页493。

缘化的心境，同理心地感受东南亚华人的苦闷与矛盾。戴国辉以世界史的研究高度，把握当地的历史文化脉络，探索东南亚华人的内在问题。如今，东南亚华人研究虽言早已超越前代许多，学界出现不少创新理论和新的研究视角。²⁴ 惟就70、80年代戴国辉的华人研究视角来看，至今仍有许多可以学习和延伸探讨的课题。

参考书目

戴国辉《华侨：“落叶归根”から“落地生根”への苦闷と矛盾》，东京：研文出版，1980。

戴国辉《“中国人”的中原意识与边疆观——从自我体验来自我剖析或解释》，《戴国辉全集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台湾客家的认同问题》，《戴国辉全集4》，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蒋智扬译《对中国人而言之中原与边境——与自身之历史（台湾、客家、华侨）相连起来》，《戴国辉全集8》，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莫海君、彭春阳译《客家系“华侨”的故事——世界客属第五届联谊大会》，《戴国辉全集·未结集12：东南亚

24 例如：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王赓武著，张海洋译《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心》，载于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211-230；吴小安《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收载于李安山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100-102；颜清湟《新马华人史研究的反思》，《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页47-52；王苍柏《华人网络的再认识：一个空间的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6月第2期，页22-30。

华侨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冯雅晴、吴元淑译《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华侨研究与华侨观的省思》，《戴国辉全集12·未结集：东南亚华侨研究》，台北：文讯杂志社，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观点》，《戴国辉全集11》，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李毓昭译《来自内部的“华侨”论——以东南亚为主》，《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雷玉虹译《马来西亚的布米普特拉政策与华人》，《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戴国辉著，雷玉虹译《世界的动荡与东南亚华人的未来》，《戴国辉全集12》，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

Leo Suryadinata edit.,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罗伊菲译《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

赵树冈《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9月第3期。

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

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王赓武著，张海洋译《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心》，载于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吴小安《华侨华人民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收载于李安山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颜清湟《新马华人史研究的反思》，《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

王苍柏《华人网络的再认识：一个空间的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6月第2期。

汤锦台《千年客家》，台北：如果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祝家丰）

Tai Kuo-hui and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tudies

Onn Huann J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Southern College

Abstract

A renowned Japanese scholar, Tai Kuo-hui,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on being marginalized, shares the feelings of gloom and dilemma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ai Kuo-hui, with an excellent knowledge of world history and a good grasp of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explores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s a minority facing identity crisis, and the un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ai is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etic. He holds t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is not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but has been the pursuit of the oppressed in the Third World: freedom, equality,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which are the issues facing mankind.

Keywords: Tai Kuo-hui Southeast Asia Chinese Malaysia